

语言文字学论文集

YUYANWENZIXUE LUNWENJI

许嘉璐 著



商务印书馆

语言文字学论文集

许嘉璐 著

商务印书馆

200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文字学论文集/许嘉璐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ISBN 7-100-04392-1

I. 语… II. 许…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汉字—文字学—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058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ŪYÁN WÉN ZÌ XUÉ LÙN WÉN JÍ

语言文字学论文集

许嘉璐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392-1/H·1102

2005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7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张 17 1/2

定价: 30.00 元

自序

这些年来我几乎中辍了训诂学传统范围内的和古汉语的研究。原因是朋友们所知道而且体谅的：一是公务始终未得稍懈，而研读古籍、参阅文献、思考问题，需要比较完整的时间；到了写作阶段，思路最好不要时续时断。要做到这一点对我来说近乎奢望。二是十年来因为涉足中文信息处理和文化问题的学习与研究，既把偶尔出现的零散时间占去，也让我胆更怯了——以往就语言谈语言或就文字谈文字（胡裕树先生称之为“‘关门’研究”。见为《称谓修辞学》所写的序），固然也是需要的，但总不如视野更为宽阔些好；而一旦试图从更多的别的视角观察语言文字，则又立即感到知识之不足，思考之狭窄，使我愈益自觉浅薄，所以虽已“开门”而收效不显，提笔自然十分踌躇。这样，徒增量而不欲为，欲增质则乏其力，于是虽未彻底搁笔，却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发表了。因此这里所能提供给读者的，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和信息，这使我不能不有内疚之感，是应该向朋友们和读者抱歉的。

本集中的文章，《读〈尔雅·释亲〉》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这主要是因为想再抽时间打磨打磨，论证力求再严密些。但自从在北京师大汉语文化学院讲过之后，就再也没挤出时间来。学生还是被先遣的“小姑”而已，长久不见“姑”舅也不是事，不如在更大范围内听听读者的意见，于是夹在谈文化的一些讲演和文章里凑成《未惬集》发表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现在也收入这个集子

里。这篇讲演虽然自觉并不成熟而又分别收到两个集子里,有这样一层意思:这是继《〈尔雅〉分卷与分类的再认识》之后的又一次尝试,是想把训诂学和文化学结合起来研究的试产品之一,所以用“《尔雅》的文化学研究之二”作副标题。自己经过这些年的摸索(连同《说“正色”——〈说文〉颜色词考察》等文章和正在思考的其他问题在内)似有所悟,但还拿不准这是不是一条路子,极为渴望得到时贤的指点,于是就不揣寡陋了。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其他文章,则是最近这些年“旁骛”所得。其中有有关语言与文化、汉字识字教学的,自然是研究语言且同时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必然或应该关注的;语言文字规范方面的文章则是前些年“被动”倾力于此成果的反映;中文信息处理是我这些年“出界”最远的兴趣之所在,所以既有所得,也就笔录成文,近日还有一篇反映这一领域进展的文章,但来不及收入了。

这个集子,全承友生朱瑞平和舒雅丽、黄晓琴搜集、整理,责任编辑史建桥所花的力气可能又在他们之上,理应在这里特别标出感谢之意。商务印书馆一向以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名世,现在居然把我这个集子也列入许多著名学者的语言学论文集出版计划,不但应该更加感谢,而且我要说,这使我愧赧不安,我应视此为激励与鞭策。

2005年4月24日夜于

日读一卷书屋

目 录

自序	1
关于训诂学方法的思考	1
关于训诂学教学的几个问题	12
论同步引申	24
注释学刍议	42
《说文解字》在词典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64
《说文解字》释义方式研究	99
苍史功臣 叔重诤友——《说文》杨氏学述略	127
何添《王筠〈说文〉六书相兼说研究》序	150
略论杨守敬《水经注疏》	154
《黄帝内经太素》杨注例评	165
《文选》黄氏学训诂探赜	185
章太炎、沈兼士二氏语源学研究之比较	229
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	240
科学研究近代俗语的先驱——纪念黎锦熙先生 诞辰 100 周年	281
礼、俗与语言	293

《尔雅》分卷与分类的再认识——《尔雅》的文化学	
研究之一·····	303
读《尔雅·释亲》——《尔雅》的文化学研究之二·····	323
说“正色”——《说文》颜色词考察·····	352
中文信息处理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365
现状和设想——试论中文信息处理与现代汉语	
研究·····	387
语言计划与辩证法·····	402
语言文字规范化与语言文字研究·····	465
语言文字规范化与语文教学·····	475
中国小学识字教学的研究与建议——《识字教学法	
论文集》序·····	484
中国语言文字的现状和对策——兼论 1997 年后的	
香港语文·····	490
汉字结构的规律性与小学识字教学——兼评几种	
小学识字教学法·····	502
汉字形符的类化与识字教学·····	519
汉字声符的分化与识字教学·····	531

关于训诂学方法的思考^①

一、是谈方法论的时候了

训诂学的历史漫长,大家代有,名作迭出,其间无不蕴藏着系统而可靠的方法。清代训诂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流派多,风格异,2000年间的训诂要义在清人那里无不得到集中和升华。生于今世,似乎只要掌握好前人所积累下的经验,把它用到更为广阔的领域也就够了。

这几年我经常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刺激。一个方面是在训释考据工作时运用前人经验失当,而探求新意又过于离奇的现象;另一个方面是释义或论述训诂规律时的一般化、肤浅和陈旧。这两个方面都难以令人不有忧虑。有意思的是前者多发生在比较年轻的朋友身上,后者又恰恰相反(当然都不是绝对的)。这或许是“代沟”在学术上的表现?我倒觉得这两方面正反映了学界同人的共同的良好愿望:前者不满足于历史和现状,希望有所创新和前进;后者则力求慎重稳妥,怕训诂学走到歪路上去。训诂学似乎正处在十字路口上。

就训诂学界的总体说,只讲传统是不行的。这并不排除有些

①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学者只用他已用得纯熟的工去制造新的产品。只讲传统就没有了发展。试看历代训诂大师,扬雄、许慎、郑玄、郭璞、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李善、朱熹、戴侗、黄生、戴震、王念孙、段玉裁……哪一位是那么“忠实”于前代毫无独创的?又有哪一位把训诂学带到了完美无缺的境地没有给后人留下开拓的余地?时代的发展必然向学术提出新的问题,带来新的发展,这是个现实问题,而不是个理论问题,毋庸絮絮。

慎重和稳妥也是必要的。训诂学是门很实在的学问,无论使用什么方法最后都要落实到一本书、一句话、一个词上去,懂就是懂,解不通就是解不通,一点假也掺不得。如果不能验之于事而是,就会问之于心不安,因为那将蒙了读者,贻误后人。可是如果因为偶尔碰上声称古人都该推倒实际只是换换名词儿的“理论”就以为是创新的代表,并由此而产生逆反心理,更想求慎求稳,则也不必。那是个学风问题,与方法论的探讨无涉。

大家站在十字路口一起议论议论往哪条路上走以及今后怎么个走法是很必要的,其结果也许是殊途同归。退一步讲,哪怕得到的结论是仍按老样子走下去,或各走各的路,也是不错的,起码再举步的时候能够人人心里踏实。特别是目前这个时刻,几乎与古代文化有关的所有学科对训诂学的期待,现代科学技术的浪潮对人文科学的冲击,人文科学中其他门类对各自方法论的积极研讨,都向训诂学提出了反思方法论问题的必要和可能。

现在是谈论方法论的时候了。

二、探讨训诂学方法论的寂寥

这个问题需要从我国语言科学的状况说起。

毋庸讳言,我国的语言研究远远落在我国许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后面,当然也远在世界语言科学之后。这里所说的落后不是只着眼于研究队伍的量和质、成果的多和寡,更重要的是语言学在科学之林中的地位以及为别的学科提供了多少可资借鉴的东西。不论在世界语言学史上还是在我国的语言学史上,都有过这样的事实:语言学成了先导的科学,它向其他学科,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提供了新颖的思想和方法,推动了整个科学领域的发展。在近代世界科学史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过程:语言学的一些观念和方法直接启发了自然科学,或者与自然科学的结论相互印证,人文科学又从自然科学那里得到启示,于是向前跃进,并且进一步完善了这些观念和方法,接着又反过去影响了自然科学。例如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一些思想就是如此。我国乾嘉时代的考据之学在历史上也曾经起到过类似的作用。

但是近百年来我国语言学的状况却与此相反,基本上是直接受到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与此同时,西方的自然科学刺激了我们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如哲学、美学,等等,然后这些学科又反过来作用于中国的语言学。我们的语言学始终处在学科间相互推动的链的尾端,从没有拿出什么完整的、从语言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思想和方法贡献给其他学科。

这样一个状况不应该由现代的语言学家们负主要责任。首

先,这是近百年来不重视人文科学,近几十年来忽视语言科学的后果。其次,大约从乾嘉时代起,语言学家们几乎忘记了哲学,重实证而轻思辨,重感性而轻理性,不善于把实际已普遍使用的科学方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用认识论去阐释和论证这些方法。我国古代人文科学的混沌状态使得先秦的许多思想家也兼为文献学家、语言学家;从汉至唐,许多语言学家也精通哲学;这一传统随着宋明理学的衰灭而中止了。清初大儒顾炎武等人把有明之亡归咎于明学的空疏,于是提出经世致用的口号,由他们倡导和创建的考据学派及其学风直接哺育了乾嘉一代学术。而到了乾嘉,由于学术发展所造成的分工,更由于对哲学的偏见,竟视小学与哲学为对立物,表现出来的就是汉宋之争(虽然汉学并不等于小学,宋学也不等于哲学),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当时只有一个戴震,二者皆精,因而在治小学的方法方面建树也多,只可惜和者盖寡,连他的学生们如段玉裁、王念孙,也没有学到这一手,因而只能承其一体,在局部上发挥发展。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传统,影响是巨大的。直到今天,语言学界,特别是训诂学界,偏重考据忽视理论的倾向犹在,懂得哲学,能够沟通哲学与语言学的人很少。这恐怕是我们的语言学难以产生新思想新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因。

以上是就整个语言学研究而言。如果单看训诂学情况又如何呢?首先,由于训诂学绵亘两千载,遗产极丰,传统的影响已经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前进中的沉重包袱。其次,由于训诂学材料浩繁,也由于人们缺乏透视的利器,潜在于其中的优秀传统和朴素的方法论思想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甚至没有被充分注意。再次,由于长期以来忽视对口语的研究,训诂学内部缺乏研究的对比物,因而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历代正统的书面语言——的特质,例

如文献语言中的人为因素,缺乏足够的语境暗示等等反而认识得不透,当然也就不会对语言的发生发展给予更多的关心,这也妨碍了由训诂学研究中生成更为丰富的方法和理论。总之,训诂学方法论的研究较之语言学的其他分支更为落后。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前的训诂学就呈现了前面所谈到的奇特现象:在语义规律、训释方法的理论探讨中要么停留在一般阐述、重复成说的阶段,要么生硬地套用西方语言学的一些观念和结论。这样,认真地对训诂学方法进行探索者当然也就寥寥了。

三、传统训诂学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对于训诂学工作者来说,方法论的探索是回避不了的。

传统训诂学的方法经历了千百年的积累、考验和删汰,至今仍在指导着训释实践。但是由于这些具体方法缺乏理论的或哲学的论证和说明,在实践中难免被误用和歪曲。在训诂学逐渐普及的今天,从方法论的角度给人以指导,维护传统训诂学方法的严肃性是十分迫切的任务。例如,声近义通、一声之转、循声求义本是先哲的重要发现,也是训诂学的重要观点和方法,但是五十年前就有人居然用这种方法证明许由就是伯夷,也就是皋陶,鲧就是共工,就是玄冥、冯夷、台骀。现在又有人使用同样的方法把伏羲、羲和、女娲、嫦娥、太昊、帝喾、黄帝,乃至后代的狐仙证明为一,共工即洪江,等等,比当年的古史辨派更进一步。其结论可靠与否姑置无论,单说判定某字“转”的根据就背离了训诂学的方法。例如为了说明伏羲即羲和,先说伏借为溥,溥羲即伟大的羲。且不说伏、溥韵能否相通,就以训诂学已知的规律说,假借乃是一种社会习惯,

不能甲乙只在此处相借而他处不见。伏借为溥即于文献无征,何况文献中从未有过“溥羲”。伏羲既是溥羲,羲字也就可以单指,于是进而证明羲=羲和。为此,作者先定下一条古音规律:凡今音 xi 者古皆读为双音节 xi-e,连续即成为 xiè。这个大前提首先就成了问题。从古音史上实在得不出这样一个规律,因而也就违背了训诂学讲音转、义通的原则^①。其他如昊之与黄、共之与洪、工之与江,也无不是“非训诂的”^②。不然,任何人用了这一法宝都可以证明刘备就是吕布、宋江是孙皓转世、猪八戒是唐伯虎的音转了。训诂学方法的这种滥用应该引起训诂学家们的深思,引起对方法理论化的重视。

传统训诂学的方法在深入研究古代文献语言的今天显露了它的不足,这是当前促使人们研究方法论的另一个动力。清代以前的训诂,基本是“指示性的”诠释,即由经学家、训诂学家告诉人们“这是什么”。虽然其间也有分析,但并未深入到语言的内部规律。这种指示的来源不外两个:前人成训和诠释者的经验。而前人的成训又来自同样的两个来源。如此推究上去,最后只是经验一途而已。当然时代越晚,归纳和验证的比例越大,但传统训诂学的哲学基础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似无疑义。清人对此有所突破。“以经证字”口号是归纳法的大纛,“以声音通训诂”则表现了深入语言

① xi-e 与 xi,显然用的是拼音方案。作者忽略了在拼音方案中字母 e 代表着两个音: e 和 ê; 由于在 i、ü 后面读不出 ê 的音来,所以省去了 ê 号。因此“xi-e(ê)”缓读与急读都读不出作者所希望读出的音来,当然也就得不出伟大的羲就是羲和的结论。大概作者对羲、俄、邪古音相通的现象误解了。通者,古韵相近可以相互转化,这跟连读单读是两码事。

② “洪江”在上古文献中从未作为一个词出现过。因此即使“共工”的语音可以转为“洪江”也无济于事。

内部的自觉。可惜他们没有再开拓一步,也没有能再深入些,以摆脱“指示性”的局限。

依靠经验所做的指示性诠释无不带有诠释者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波普尔也有类似看法,见《猜想与反驳》,中译本,1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即如以声音通训诂,你以此为语源,我以彼为语源,你说该转为甲,我说该转为乙,至于甲乙转时又取各自多项意义中的哪一项,也会见仁见智不一。尚需证明的东西被拿来作为指示的依据,这是传统训诂学最大的局限之一。另外一方面,传统的方法以让人知道“是什么”为满足。即如词义的发展演变,最完美的结论是某引申为某、又引申为某;某有某义,故引申为某。至于词义引申的内因外因、引申的随机性和必然性、引申途中是绝对均衡的还是也有从混沌到有序的过程、其间有无由量到质的突变、如何测知关节点等等这些更为深入的问题,是进一步研究(而不是诠释)文献语言所必然遇到,又远非归纳条例、形音义互相求的方法所能解决的。这就需要方法的发展、创新。

四、宏观意义上的训诂学方法

我在《论训诂学的性质及其他》(《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古代汉语专辑],1986)中曾经谈到过在训诂学研究中应该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归纳与演绎、验证与思辨结合起来。这些就都是宏观上的方法问题。在这里我想补充两点:(1)训诂学的封闭研究与研究的延伸;(2)把训诂学的对象作为一个统一与不统一相结合的矛盾体来研究。

传统训诂学以训释实践为其主要形式,以文献语言的内容和

形式为其对象,因此它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语言以及用语言形式表现的名物、典章、文化、风习等等都在其诠释范围之内。现代训诂学开始了对诠释工作的理论研究,更重视训诂学的语言学性质,削弱了对语言所表现的内容的注意。近几十年又由于学科的分工,治训诂者也相应地习惯了对语言规律的研究而对社会的、文化的现象却生疏了。这样,训诂学出现了封闭性。如果说这一变化是训诂学发展史中不可避免的阶段,那么,现代的训诂学就应该在更高的层次上把训诂学与社会学、文化学等等结合起来。这就是所谓训诂学研究的延伸。这样做的好处是:(1)可以更好地保持和发扬传统训诂学的民族特色;(2)使训诂学获得更广阔的应用领域;(3)使训诂学注意到深层的语言背景,因而可以更深入地分析文献语言的演变规律。

但这绝不是简单地回到训诂学的往古形态,因为这样延伸的目的已不同于古代的诠释,而其所借助的资粮也已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这里不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文》对“婚”字的说解是:“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许慎指出了“婚”得义于“昏”,但他未能指出“以昏时”的正确原因。现在我们利用古代社会学、民族学成果就可以说明婚之源于昏,乃是母系社会瓦解后抢婚制度的遗踪。这一结论不但有助于我们证明“娶”来源于“取”(《说文》:“捕取也。”)、“女”原始义即“奴”等等,而且这种推寻和考古学相配合,就不难从语言文字中勾稽出先民生活的图画,以补信史之不足,许多至今未决的问题,例如词义引申的具体内因和外因、社会观念与语言的关系等,也可能在这种学科延伸的过程中取得进展,得到更深入的说明。显然,训诂学开放的结果,在加深拓宽自身的同时有可能与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

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共同孕育出几个边缘学科。

训诂学研究的对象(指文献语言的全部而不只是词)统一与不统一的提法,是针对过去流行的观念说的。把语言以及语言的各个部分内部看成是统一的系统,这是多年来的习惯。实际上这并不符合事物的客观法则亦即辩证唯物主义。例如形音义是统一的,也是不统一的,否则就不会有字的孳乳、词义的分化、假借字等现象。又如语言约定俗成的过程也是统一与不统一的过程:语言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甚至可以说语言(语音、词汇、语法以及修辞)发展的起点往往是个人无意地背离常规的使用和有意的创造。社会对个人的语言现象并不只是约束,它 also 进行选择。一旦某种个人的语言被社会所接受、进入到全民语言,这一具体的发展过程就终止了,语言得到了暂时的相对统一。而另外一些个人的语言现象则被社会拒绝,于是消亡。语言的这种竞争造成了语言发展的随机性。由于我们过去过分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一面,把问题看简单了,因而妨碍了对文献语言的更细致的观察。此外如语言与客观现实、语言与思维之间,也是既统一又不统一的。这样看待语言并不意味着语言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把它看成了动态的统一和平衡。这是语言观问题,也是方法论问题。

五、微观意义上的训诂学方法

至今我们仍然停留在传统与外来的交叉点上,二者也并没有有机地结合。我们还缺少具有时代特色的、根植于文献语言、由训诂学家们自己提出的方法。单一的从西方语言学中直接借鉴的道路是不敷需要的。单靠引进我们就将永远跟在别人后头,训诂学

理论的体系也将难以建立。应该吸收哲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最新成就,试用于训诂学的研究。在这点上,我只是朦胧地有这样一种想法,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具体的见解。为说明观点,这里试举一个我在教学与读书过程中思考过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是分层次的,词语的意义也不应例外。例如乚、句、勾、口、夭等是同源词(其中每个字又各有一系列孳乳字,如拘钩、構講媾等),它们的音与义既有共同点,又各有“个性”。过去我们是把这类现象放在一个平面上进行观察的。如果考虑到这些词的使用状态以及使用者对它们的感受,恐怕其共同点(沈兼士先生称之为公约数)处在深层的位置,而其“个性”则居于表层。每个词的表层义与其词族的深层义之间的距离,则视其音(纽与韵)、义的变化而不同。据此以观察词义的演变就可以发现,意义并不是从其表层引申的,而是“双轨制”:从表层引申的,往往产生新字(例如以竹为筍、以金为鉤);由深层引申的,则不另造新字(如婚媾、媾和)。这个想法有无道理?还不敢说。我只是想,训诂学的微观研究也不能满足现状,应该充分利用我们历史文献特别丰富、训诂学传统特别悠久这一优势而努力前进。无论是宏观上的还是微观方面的方法的进步都可能为语言学理论提供新的营养,并非只是训诂学自身受益而已。

训诂学方法论的研究刚刚起步。在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消化和吸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现在起码可以进行以下的工作:第一,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认识和论证古人所使用的方法;第二,运用已被其他学科证明有效的方法说明已知的训诂学现象;第三,运用其他学科的一些方法去认识未知。